

『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

——七大代表奔赴延安的艰辛历程

□ 李 蓉

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全国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要集中到延安开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的因为路途遥远，距离延安甚至几千公里；有的直线距离虽然不算太远，但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仍然困难重重。除了中直、军直代表团和陕甘宁边区、晋绥代表团就近不用长途跋涉，其他代表团如晋冀鲁豫、山东的代表，特别是华中、大后方代表都是一路艰辛，向着向往已久的延安进发。陈毅所写诗作“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向清凉山”，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各地代表不畏艰险奔赴延安的心情。

冀南代表两次出发。1939年9月8日，冀南的七大代表统一换上八路军军服，在冀南军区武装部队护送下向延安出发。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为加强统治，切断太行山区和冀鲁豫平原的联系，对平汉等铁路线的控制和封锁特别严密，在铁路两侧各挖了宽4米、深3米的封锁沟。10月份的一个夜里，代表团由河北内丘县境过平汉铁路时，不料被敌人发觉，又遭遇封建会道门“六离会”的骚扰，未能通过封锁线，不得不退回巨鹿县西部。代表团原准备研究好对策后再度前进，忽然接到中央通知，让他们暂缓到延安。于是代表团又返回根据地。

11月底，代表们又接到命令，再次出发。冀南代表们在部队掩护下，昼宿夜行，披星戴月，于夜半时分在内丘县北、尧山县西横穿平汉路，穿过了这道严密的封锁线，告别了华北大平原，眼前呈现连绵不断的山地。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大家兴致勃勃，毫无怨言。

1939年底，山东代表向延安出发了。一路上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过微山湖时，还和日军打了一仗。经过艰苦的行军，穿越敌占区，他们到达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因为日军对太行山区封锁很严，山东代表团和集中到这里的冀南、晋东南代表团一起进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1940年5月下旬，他们又随晋察冀部队跨过正太铁路，来到晋察冀边区的河北平山、阜平，住了3个多月。直到百团大战开始后，聂荣臻司令员派骑兵团护送，他们才和随后到达晋察冀根据地的华中、大后方代表团一行100余人，从阜平出发，经过五台山，从山西崞县越过同蒲路。

八路军第120师贺龙师长派部队前来接应。代表们一行穿过敌占区，涉水渡过汾河，来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山西娄烦镇的八路军第120师兵站，然后到山西兴县县城。这时正是

中秋节，贺龙、林枫前来看望大家并设宴招待。停留数日，他们从黑峪口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等地，于1940年10月10日到达延安。他们到延安时，朱德总司令骑着马过来欢迎。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欢迎会，欢迎从敌后来的七大代表。

赴延过程艰险重重。1940年4月，晋察冀根据地的100多名七大代表在河北阜平县集中，准备赴延安参加大会。代表们分成两个大队：军队代表是第一大队，地方代表是第二大队，还带了一个警卫连负责安全工作。

在晋察冀前往延安的途中，敌人设置了多道封锁线，代表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起早贪黑，一天走六七十里。5月26日，队伍计划在太原市西南、阳曲以北的白水镇过同蒲路。穿过铁路后，刚一进山就遭到敌人袭击。敌人把前后路都封锁住了，前进过不去，退也退不回来。警卫连战士冲上去阻击敌人，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部长鲁贲带头从山侧跳崖，姜占春也跟着跳了下去，到半腰碰到石棱把他架住了。这时，从上面又跳下一个人撞在他身上，他们一起滚到了沟底，姜占春的左肩被摔得骨折。姜占春负伤后，虽然膀子很疼，但仍坚持追赶队伍。

在这场遭遇战中，鲁贲、吴健民等牺牲，不少同志负伤。突围出来的队伍过了汾河，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亲自接见、安排，给他们配备马匹、服装，给伤员作了治疗。1940年6月18日，他们到达延安。

晋察冀代表在途中遭遇敌人袭击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重视，立即为此事致电要求各地采取措施，保证代表途中的安全，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此类事故。

历时一年多的小长征。1939年9月6日，浙江省的七大代表离开温州平阳县的冠尖、马头岗，向延安出发。途经山东时，七大代表刘先得了伤寒病，发高烧，病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团部特地向当地老百姓雇来毛驴让刘先骑。到达鲁中时，遇到在这里检查工作的徐向前，他一听代表团里有人患病，便特地派医务人员前来看望，并拿出当时珍贵的“盘尼西林”针剂，一连打了几针，才使刘先的高烧逐渐减退。

从香港、梅州、韶关出发的广东、闽粤赣边区等地代表，从1939年11月出发，先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又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同来自上海、浙江等地的华中代表、大后方其他代表会合，沿途见到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经过近14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于1940年12月26日下午抵达延安。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经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10个省，行程上万里。

到延安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并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刘少奇、陈毅赴延安。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华中工作的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要求“护卫刘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少奇：“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途中，刘少奇多次遭遇险情，他沉着应对，同护送的指战员一起渡过了这些艰险。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经淮北、山东、冀鲁豫、冀中、太行、太岳、晋绥，历时9个月，行程数千里，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终于从华中安全抵达延安。

1943年11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接到通知后，陈毅于11月25日离开华中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过洪泽湖，然后在铁道游击队掩护下，过津浦路和微山湖，穿过安阳，越过平汉铁路，沿清漳河北行，抵达太行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山西左权麻田，经晋冀豫向晋绥前进，渡汾河、过同蒲路封锁线，过吕梁山区，于1944年3月7日到达延安。

代表们到延安后，因大会延期，大多数代表进了中央党校学习，以后又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为七大召开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杨 树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总校太行山办学所在地，全国唯一一座抗大纪念碑矗立于此。1986年6月1日，在抗大建校5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和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在校部旧址前南峪村建造了抗大纪念碑。胡耀邦亲笔题写碑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纪念碑”，东侧碑身由徐向前题词“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为改变老区的面貌而努力”，西侧碑身由李志民题写“抗大精神、永放光芒”。时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何长工题写《邢台浆水抗大总校太行山驻地碑文》。碑文如下：

抗大它是伟大时代的产物，也是陶冶锻炼伟大时代英雄的熔炉，在我党建军史上有着巨大的贡献。一九三六年，全国各路红军齐集陕北以后，根据形势的需要，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陕北保安创建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到第二期迁校延安，即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一九三九年，根据中央指示深入敌后办校，由陕北转移太行山，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抗大总校即全部到达邢台浆水川一带。浆水川地处第十八集团军领导之英勇善战之一二九师活动地带，抗大有了多方坚强保证，就在这里当做长久办校基地。当时校部住在前南峪，政治部住在浆水镇，其它如坡子峪、宋家峪、冯家沟、桃树坪一带的村庄都住满了抗大的学员和机关。由于环境比较安定，抗大即以正规化为中心，总结经验，编写教材，指导各个分校改进工作，顺利地完成了第七期教学任务，并隆重地举行了抗大建校五周年纪念大会。一九四二年初进行第八期招生，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学。这时滕代远同志调去总部，由我担任副校长主持工作。抗大深入敌后，在浆水川待的时间最长，和这里的人民结成了鱼水不离的关系。我们曾派干部帮助建党建政，派武工队去和地方干部共同打击敌人，帮助开展

文化教育工作。而浆水的人民对抗大帮助最大，在五一反“扫荡”中帮助我们坚壁清野，打麻雀战，处处迷惑打击敌人，才取得最后的胜利。一九四三年春，根据中央指示，我们总校全体人员告别了浆水川的父老兄弟重返陕北。我们常想，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抗大全体人员吃的是浆水川的粮，喝的是浆水川的水，是浆水川和太行山的广大人民把我们养育壮大的，我们在此受到了深厚的教育和锻炼。对此，我们将永志不忘。愿我们后人能够继承和发扬浆水人民的光荣传统和抗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就象太行山那样巍峨雄壮，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的繁荣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
何长工
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碑文简要描述了抗大的创建历史，详细记述了从1940年到1943年抗大在浆水川一带的办学情况和主要活动，最后表达了对浆水川和太行山广大人民养育之情的“永志不忘”和对后人的美好愿望，读来感人至深、倍受鼓舞。

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

抗大到达延安后，爱国青年、抗日志士纷纷如洪流般奔赴延安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高兴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成为抗日的一面旗帜，享誉国内外。1939年7月10日，抗大总校与联大以“八路军第五纵队”番号，踏上了由陕北转移太行山的征程。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即全部到达邢台浆水川一带。之后，抗大师生在四面八方接近敌人。在百团大战中，抗大学员组织6个见习团参加战斗，在各个指挥机关了解战役进展过程。学员小组还协助第120师、129师、晋

察冀军区司令部，专题总结灵县战役、榆辽战役等战役经验教训，编撰战例汇集，作为抗大军事教材。抗大学员对敌战斗更是不计其数。冈村宁次多次叫嚣，要用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在1942年的五一反“扫荡”中，日军4路合击抗大总校，妄想用“铁壁合围”将抗大师生一举消灭。抗大总校与敌人顽强周旋两个多月，边战斗边教学，配合主力部队歼敌17000余人，彻底粉碎“围剿”。抗大敌后办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

肩负着开辟敌后战场、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干部的重任

在抗大挺进敌后的欢送大会上，毛泽东赠送抗大师生“三个法宝”，即坚持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内部团结。抗大敌后办学肩负着开辟敌后战场、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干部、团结带领广大民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重任。抗大总校到达河北邢台后，浆水川家家住满抗大学员，人人都是抗大房东。当地群众主动腾房并屋，接收抗大学员；学员们遵守制度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时刻刻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不与老百姓争柴，抗大学员孙保德爬上山顶去砍柴，不慎跌入悬崖；在反“扫荡”中，抗大学员靳惠民从包围圈中救出了80岁的老房东……老区人民为了保护抗大物资舍生取义，为了保护抗大伤员宁死不屈，为了保护抗大后代牺牲自己的孩子。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抗大师生与人民群众形



成了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此外，总校多次派干部到地方帮助建党建政，派武工队和地方干部共同打击敌人，帮助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并以正规化建设为中心，总结办学经验，统一编写教材，向各个抗日根据地派出教员骨干，在全国指导、创建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党的力量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其中抗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据不完全统计，在抗大任职任教和学习过的干部，仅1955年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00余人。其中元帅7人、大将8人、上将29人、中将100多人、少将300多人。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恽代英：“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

□ 林珊珊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场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43页

南京市建邺区茶亭东街242号，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北侧，有一排红砖灰瓦的平房，墙面斑驳，苍松翠柏围绕其间，弥漫着厚重的沧桑感。这里曾经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关押和迫害了许多革命进步人士。91年前，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就在这里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

“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1915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华大学学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恽代英文笔出众，博学多才。1918年11月，他发表《力行救国论》，指出救国不在空谈。他在阅读东西方各国历史之后发现，其他国家或改良强国、或实业富国、或移俗安国、或扩军盛国、或教育兴国、或民主定国，种种良策，到了中国却“一无效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国，这些方法要么是说不行，要么是行而不切，只是“说饼而欲求饱腹”。面对这种情况，恽代英认

为“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在他看来，我们所欠缺的不是在救国理论上的彼此论证，而是救国行动上的雷厉风行，“力行救国”就是要抛去说而不行、行而不猛的救国空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救国志向。

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首次在武汉报道后，恽代英当天晚上就和同学商议响应北京爱国学生的具体行动，他们油印600份由恽代英起草的爱国传单《勿忘五月七日之事》，号召人们奋起抗争，鼓舞武汉人民投身爱国运动，联络武昌各大中学校成立武昌学生团，联合学生进行罢课、游行示威。

1924年，他从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月，他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7月，恽代英奉中央命令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9年6月，他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当之无愧的“青年运动领袖”。说到恽代英，不可不提他丰富的办刊经历。从1915年创办《遁道》到1929年底离开《红旗》编辑部，恽代英在这14年间，主编或指导了数十种刊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是团的中央机关刊物，是中国最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广大青年的专门刊物。恽代英作为第一任主编，在发刊词上大声疾呼“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青年人“需要供给他们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

在恽代英的领导下，《中国青年》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路线和政策，发行量最高达3万余份，在广大青年中间争相传阅，在那个晦暗时代里为整整一代青年送去火种。他还在该刊发表将近两百篇文章，用雄辩的口才、生动的文字，不断激发青年的爱国情感、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是当之无愧的“青年运动领袖”。

恽代英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他不断总结经验，探索了一套自己的编辑工作方法。例如，在文字方面，恽代英主张稿件内容应当通俗生动，要求“文字浅显通俗，力避专门名词”“文务求清顺，凡好为雕饰，以佶屈聱牙为高，使人不知句读者不录”；在编辑素质方面，他主张刊物必须由专业人才负责，强调“一种杂志必以一人专其责成，心不分则业易精也”；在受众方面，他主张从受众角度出发编写报刊内容，深入读者生活，及时反馈读者意见并刊登于报刊，加强传受双方的互动，如《中国青年》开设“本期研究题目”栏目，由编辑部提出研究议题，读者通过回信讨论并在下一期刊登。这些理念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这位豪情满怀的革命斗士，被敌人所切齿痛恨。1930年4月，恽代英被中央派

到上海沪东工人运动第一线。到沪东后，他每天到工人群众中宣传党的思想，动员工人罢工，准备建立工人武装。5月6日，他在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等待接头的革命同志时被捕，随后被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写下“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豪迈诗句。他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狱中向狱友讲述南昌起义经过和经验教训，还编写了解释共产党十大政纲的通俗读本，他对狱友说：“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只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1931年4月29日，一个至暗的日子。这天中午，监狱阴暗的通道中突然响起沉重的脚镣声，一群狱卒押着恽代英朝监门走去。他神色坦然、昂首挺胸，口中还在高唱《国际歌》。就这样，恽代英被敌人残忍杀害，实现了“为了给更多的人寻找光明，我必须先走进黑暗”的承诺。

恽代英的一生，短暂却灿烂。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特别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他留下的300万字左右的遗作，成为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

